重新認識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
吳密察院長專訪

策展小組

「什麼是『番』——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展已經於本（2022）年 3 月 19 日開展，這個展展出本院所藏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檔案文獻。透過這個契機，本刊專訪吳密察院長，談談他個人對於清代文獻檔案的使用經驗，以及對於本次展覽的一些想法。（圖 1）

使用清代文獻檔案的經驗

院長是知名的臺灣史學者，本院典藏的檔案文獻應該是您重要的研究史料。是否可以談談您在來到故宮前，使用清代檔案的感想與特別經驗。

我使用清代檔案的時間很早，契機是在大學剛畢業時（1978 年），曾在臺大土木系短期擔任大型防災計畫的兼任助理。當時計畫主持人是土木系的教授，他想要比較長時段地觀察天然災害的趨勢。關於天然災害，比較豐富、持續而且具有科學性的紀錄，基本上要等到日本時代以後，但他認爲清代史料的記載雖然比較粗糙，但也不妨收集起來做爲參考，我的助理工作就是從清代的臺灣地方志將其中關於「災異」的記載摘錄下來。但是地方志中的記載畢竟太過簡略了，所以又想到查找檔案資料。因爲如果有重大天災，地方官便會向朝廷奏報災損，請求蠲免、撫卹，這種奏摺對於災害的描寫就會比較詳細。當時故宮的宮中檔、軍機檔已經大致整理完成，因此我可以透過目錄卡片查找檔案，並申請複印。

此後，我的研究領域轉到日本時代的臺灣史，就比較少再接觸故宮檔案了。一直到 2000 年之後，一方面是參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的緣故，一方面是回過頭來整理清代史料，並建置 THDL（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的關係，因此才又再回來關注故宮的數位典藏和檔案文獻。（圖 2）雖然當時故宮的清宮檔案資料庫並不好用，但相對而言，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內閣大庫檔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比較起來，三者當中故宮的檔案文獻還是最開放的。2019 年我來到故宮之後一直想要改善檔案文獻的資料庫系統，我想最近上線的新版資料庫系統應該會好用很多。[1]（圖 3）

利用清代檔案的過程中，是否有特別關注過臺灣原住民族相關的檔案。若有，是什麼特別感想？

最初，我並沒有特別關注原住民族相關的檔案。故宮檔案中的臺灣原住民族相關文獻，被特別關注應該要到 1990 年代。隨著原住民族運動的發展，原住民族的歷史也受到重視。當時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便推出一個

圖1　特展陳列室入口之意象標題牆及總說明牆　本院書畫文獻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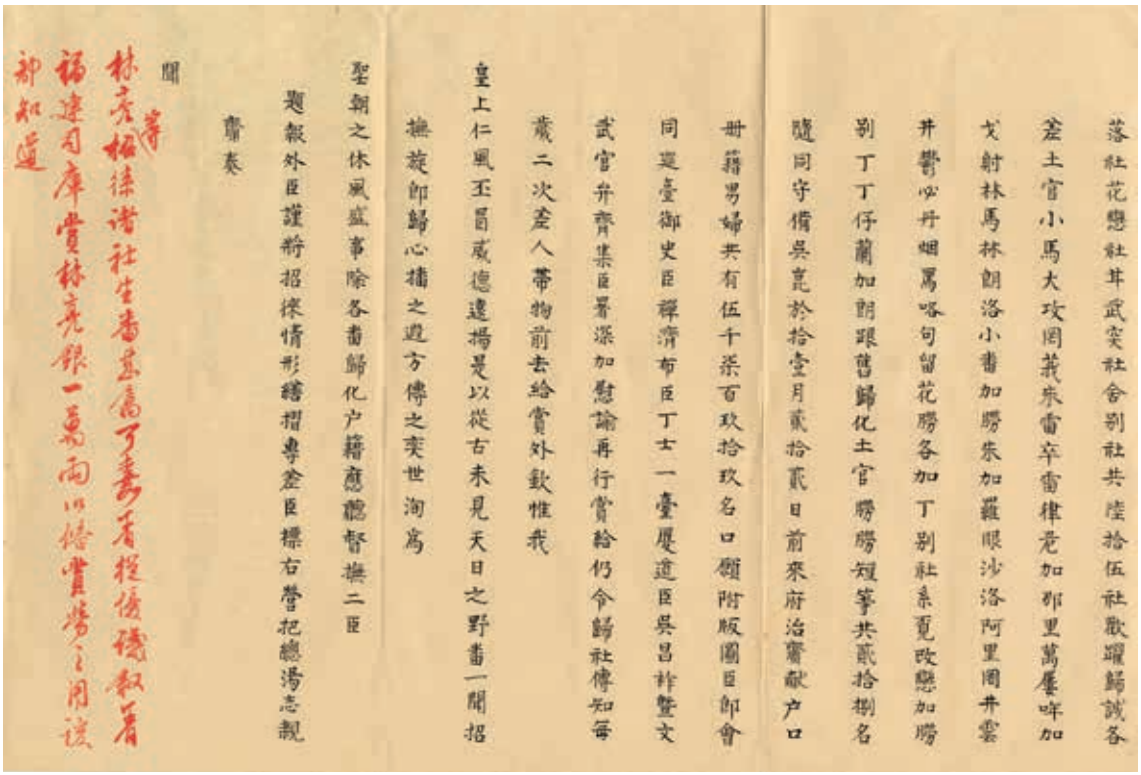

圖2　清　福建臺灣鎮總兵官林亮奏摺　〈奏報臺灣生番歸化情形〉　雍正2年11月26日　10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06380
故宮典藏的奏摺文獻，涉及臺灣史與原住民族史者有相當數量。

「臺灣原住民史料編纂計畫」，蒐羅編輯出版各種原住民史料，完成一套《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其中由梁志輝、鍾幼蘭合編的第七輯《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1998 年），就是一部很重要的史料集，它從本院典藏之宮中檔查找出臺灣原住民族相關的檔案，並重新打字編排出版。（圖 4）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或許是受到這項工作的激勵，故宮也編輯出版了《軍機處奏摺錄副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上、中、下三冊（2009 年），但這並未將檔案內容重新打字，而是直接照相製版。（圖 5）宮中檔、軍機檔都查找一遍之後，我想故宮收藏的文獻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史料應該就不多了。

隨著臺灣史研究的發展，臺灣史當中的原住民角色是否也受到重視？是否可以請您談談這方面的變化。

1984 年，我曾經「躲在連橫（雅堂）的背後」，寫了一本臺灣史。當時時報出版社策畫一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挑選幾十種中國文史經典古籍，邀請專家改寫成現代人容易閱讀的內容，至於改寫的方式則由各執筆專家自己斟酌決定，絕大部分專家的改寫方式都是挑選一些重要篇章改寫成白話文。我被指派的是改寫連雅堂《臺灣通史》。

《臺灣通史》是二十世紀初期的著作，文體已經相當接近現在的白話文，只就文體改寫並沒有太大意義，反而是連雅堂以中國傳統的正史紀傳體裁書寫，當代人已經不習慣，因此我改寫時就另外改成時下讀者所習慣的紀事本末體式的通史。於是，我拆散了連雅堂原書所提供的史事，改寫成一本新形態的《臺灣通史》，並且加入了一些符合時代價值的詮釋。此書出版後相當賣座，到目前為止已經以各種版式多次出版，即使現在都還在市面上流通。

現在回頭來看這本年輕時匆匆寫成的書，自己當然已經不甚滿意了。但當時正面地以「大遷徙」來描寫原住民受到漢人移民壓迫而離鄉

圖3　更新後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首頁樣式，提供更便捷且全面的檢索功能。　取自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

圖4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書影　取自梁志輝、鍾幼蘭編，《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圖5 書影　取自李天鳴主編，《軍機處奏摺錄副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背井地遷徙，則可以說是相當大膽的視角。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看法，應該也與當時臺灣社會的大背景有關。隨著威權統治力量的鬆動，臺灣社會也逐漸興起一些較爲具有改革傾向的想法，1984 年也有了原住民正名運動。這本書的寫作，當然也多少反映了這種時代氣氛。

從我自己的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以前對於臺灣史中的原住民角色，並不是太重視的，而且都從漢人拓墾的角度來看問題。例如，連雅堂《臺灣通史》就只是強調漢人移民的「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爲《臺灣通史》寫序的霧峰林資修更在強調漢人之堅忍之餘，對應該是受害者的原住民族多有偏見的負面描述。但是，就如原住民作家莫那能所說的，「你們的篳路藍縷，卻是我們的顛沛流離」。現在已經不能只是以漢人墾殖的觀點來敘述臺灣歷史了。

請院長談談您認為「開山撫番」，對清帝國和臺灣原住民族的意義與影響。

一般教科書都將清末光緒年間（1875-1895）的「開山撫番」，放在清朝政府面對「西方壓迫」後推動「洋務（自強）運動」的脈絡中來敘述。所以一般對它的理解就會成爲：相對於以前的「喪權辱國」，它就成爲清帝國振作圖強的一番努力了。但是，如果進一步閱讀當時的文獻（例如，當時的清帝國地方大員向皇帝的奏報），就會發現其實那是一連串腥風血雨的征服戰爭。據我所知，早在 1995 年政治大學的一篇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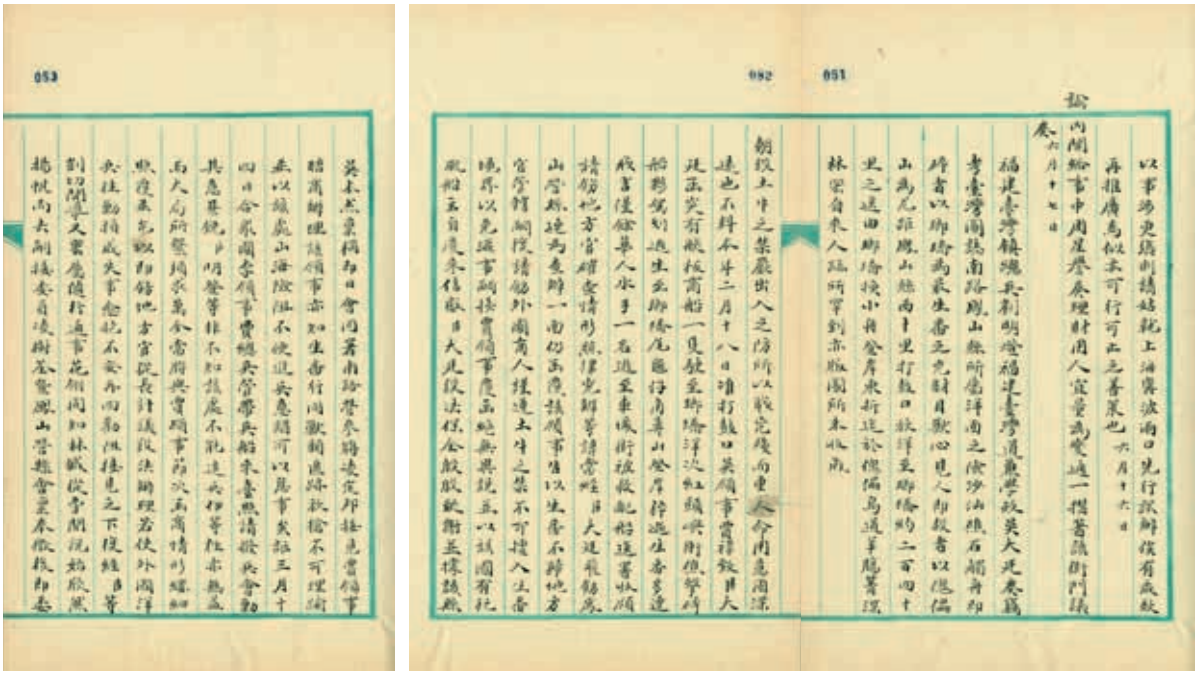

圖6　清　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吳大廷　〈奏報合衆國商船擊碎船夥被生番戕害一案〉　同治6年6月17日　《夷務始末記同治六年五月至九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官008341

士論文就已經將那個時期清帝國所發動的一連串戰爭作了初步的整理，[3] 但似乎很少人在那樣的基礎上繼續下去。

「開山撫番」所說的「開山」是相對於「封山」而說的。所謂的「封山」是清帝國政府在臺灣西部平原與丘陵、淺山的交界處，從南到北畫出了一條「（番）界」，禁止兩邊的人跨界進出。但是 1875 年清帝國不再堅守這條「（番）界」了，允許可以跨界，還想要積極進入此條界線的東部之山地種茶、採樟。甚至，還招集移民赴東部台東、花蓮墾殖，並打通進入東部之數條道路。

造成清帝國上述政策轉變的最直接原因，是 1860 年代以來界外發生了幾次與外國人的爭端。例如，1868 年的「羅發號（Rover）事件」（電視劇《斯卡羅》的原型）（圖 6）、1874 年日本出兵恆春半島的「牡丹社事件」。（圖 7）這些事件讓清帝國體認到不可再退縮性地自限於「番界」之西（「界內」），而必須將「番界」之東（「界外」）也明確地視爲版圖。並且，此時新興的出口產業之茶、樟腦的來源也要取諸於這個地區，這也驅使清帝國不能再侷限於「番界」之西，而必須從「封山」走向「開山」。

所謂「撫番」，從清帝國的統治角度來說，則是「開山」之後必須隨著進行的工作。因爲要進入山地，因此必須「撫馴教化」居住於山地的原住民族，讓原住民族不抗拒外人的進入。清帝國的作法是恩威並用，一方面以官方所認定的價值觀「教化」原住民族，一方面以武力威震原住民族，也因此發動了一連串的戰爭。所以從原住民族的立場來說，「開山撫番」是血淋淋的「被征服」的歷史。（圖 8）

圖7　1875年　〈日軍西鄉司令與原住民圖〉　《畫報》（*The Graphic*）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圖000008
《畫報》中一幅〈日軍西鄉司令與原住民圖〉版畫記錄了牡丹社事件後雙方和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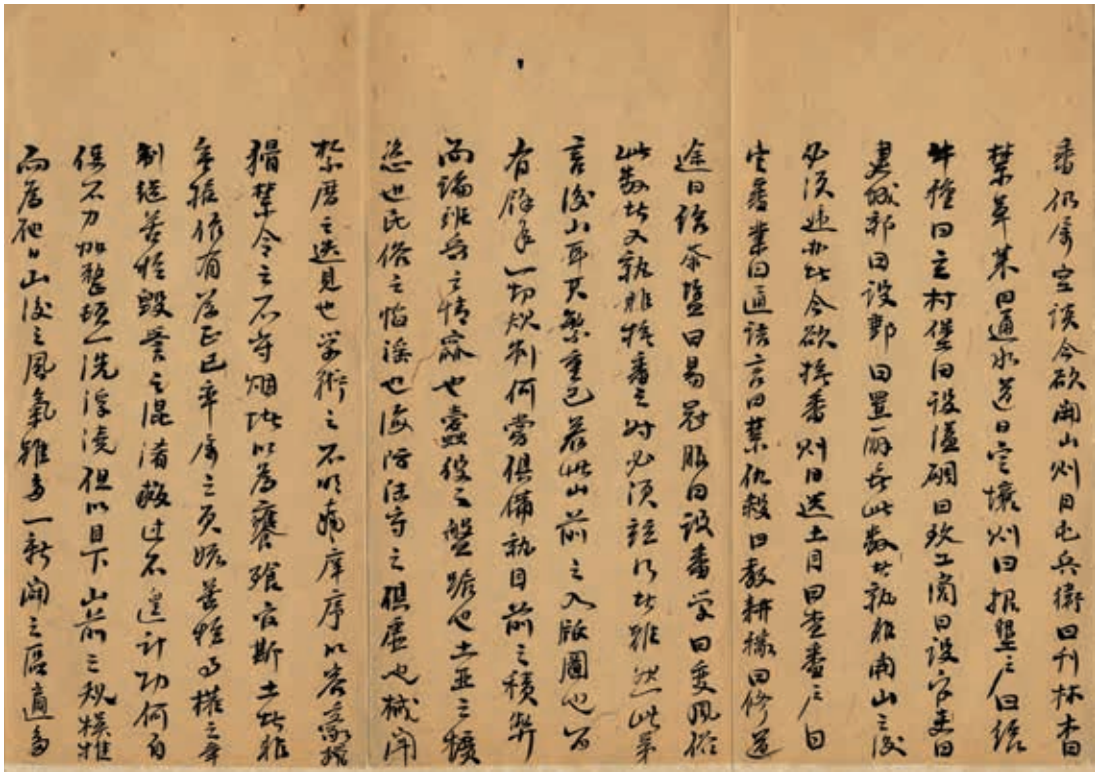

圖8　清　沈葆楨等　〈奏陳臺灣地方興革及開拓事宜〉　同治13年11月15日　20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119031
沈葆楨等官員規劃的「開山撫番」要點，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設番學等。

故宮的原住民族典藏與展覽

就任故宮院長前，您是否曾觀覽過故宮的原住民文獻展覽。若有，有何感想？舉辦這個展覽的契機為何？一、二檔採用不同的主題，是希望帶來什麼樣的效應或社會對話？

擔任院長之前，我並沒有看過故宮推出的原住民議題之展覽。策畫這個展覽的直接契機，是前不久公視推出的歷史劇《斯卡羅》。《斯卡羅》上映後頗引起社會的關注，甚至在立法院備詢時都有委員問起故宮是否有收藏相關文物。其實，說到原住民族文物的收藏，故宮在國內的博物館當中應該算是比較少的，而且大都是清代的檔案文獻。

爲了回應社會的期待，因此想趁此機會將本院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相關清宮檔案找出來做展覽。第一檔是先對清宮檔案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幾個關鍵詞，先做一些釐清，方便以後大家對於這些檔案史料的閱讀與理解。第二檔則希望以 1875 年以後（所謂「開山撫番」時期），清帝國與臺灣原住民族之遭逢爲具體案例，來看兩者的關係。這裡應該再加上一句話稍作說明：1875 年之前清帝國所面對的，主要是平原地帶的原住民族（當時在帝國中的身分是「熟番」）；至於山區的原住民族，清帝國將之視爲「化外」，基本上避免接觸。就是因爲有這種歷史緣由，所以才在第一檔中先交代檔案中的一些基本用語。

這個展覽的第一檔，直接使用了「番」字來正面對決，院長對此有什麼樣的考量。

所謂「正面對決」是什麼意思？閱讀清宮檔案有一些基本的門檻（例如，體裁格式、行政專門用語等），帝國話語也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時代侷限。因此，就如上述，必須先了解相關檔案中的基本詞彙，例如「番」、「生番」、「熟番」、「歸化生番」等名詞的意義。我們也特別希望可以分別出清帝國統治之下，

圖9 （左）位在石牌捷運站的漢番界碑，用以標示清代漢原土地產權間的界線範圍；（右）漢番界碑上所刻「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田南勢園歸番管業界」。林姿吟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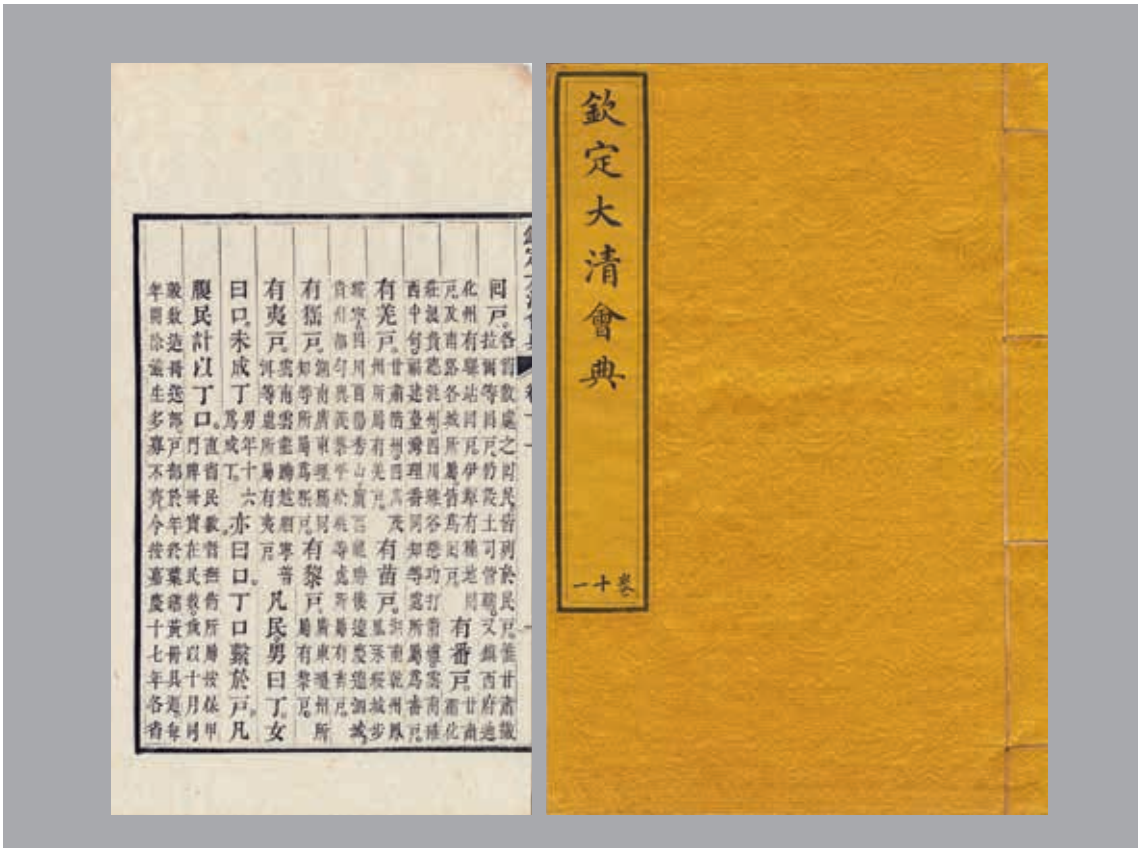

圖10　清　托津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　冊8　清嘉慶十八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16139
《欽定大清會典》中關於「番戶」的記載，即提及「福建臺灣理番同知等處所屬爲番户。」

做爲「身分」的原住民族、作爲「族群（民族）」之原住民族，兩者的不同意義。（圖 9）

帝國統治廣大的地域、各種不同的民族；因此，帝國也以不同方式來統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各有其不同的身分。那麼，在清帝國內部，臺灣原住民族的身分如何呢？清帝國的制度書《大清會典》裡面，就清楚地規定：被納入清帝國版圖之內的臺灣原住民族，是所謂的「番戶」（相對地，版圖之內、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則是「民戶」）。「民戶」必須繳納地稅（田賦）、人頭稅（丁稅）；「番戶」不必繳納地稅，人頭稅也經常被轉換成象徵性的少額之「餉」，但實際上則被地方官交付相當繁重的「役」。被納入版圖之內的原住民族（「番戶」）也被稱爲「熟番」，相對地，版圖之外的原住民族則被稱爲「生番」。（圖 10）

「番」是傳統中國以自身爲中心，對「非我族類」的歧視性用語，這種歧視與中國傳統的天下文明觀有關。臺灣原住民族既然被清帝國視爲「非我族類」之一，那麼，她作爲一個「族類（族群、民族）」的內容，又是如何呢？清代地方志中的「番俗」篇章、宦遊文人采風問俗的紀錄，爲我們多少紀錄了原住民族的語言、習俗、生活樣相、文化表現的一些線索，但我們也不能不警覺這些文字畢竟是他者的書寫，

而且有些是來自傳聞並不是實際親見，而且其中也一定會有扭曲、偏見。這些清代文獻當中，康熙末年巡臺御史黃叔璥（約 1682-1758）透過親訪以及彙集地方官呈報的資訊，編成的〈番俗六考〉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獻。（圖 11）

上述對於清代臺灣原住民族的說明，都與另一個問題，即帝國的「版圖」、帝國的「境界」有關。一般，帝國的境界，除非有很明顯的自然地理隔絕（例如，河流、山岳、沙漠、海洋等），否則總是茫漠籠統的，不似近代國家都有明確的境界線。清帝國也一樣，關於版圖及於何處，也有很多模糊地帶，即使在臺灣島內，雖畫有一條「（番）界」，但也難以確實區隔內外。不過，從官府的制度、行政（上述「身分」之所根據）來說，它卻是繞不過去的明確規定。（圖 12、13）

「番界」及圍繞「番界」的研究，是近三十餘年來清代臺灣史研究的熱點。歷史地理學者施添福教授在 1980 年代末期的幾篇文章，[4] 是開拓這個領域的先驅性研究。我指導的幾個學生，也一度集中於相關主題。[5] 施添福教授以後帶動了很多人投入此領域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研院社會所的柯志明教授，他的《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2001 年）及最近又出版的三巨冊《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2021 年），將這個領域的研究推到了後來者難以企及的高峰。

如上所述，由南到北的「（番）界」將臺灣島分成「界內」、「界外」。臺灣原住民族，也因此被分成居住於「界外」山地的「生番」、居住於「界內」平原的「熟番」。所以，「界內（熟番）」、「界外（生番）」原來並不是劃分族群的，而純粹是劃分身分的。但傳統中華帝國將管轄之下、管轄之外的族類，直接視爲在文化上有「文明開化」程度的差別——即接受管轄的比較「文明」、未接受管轄的比較「野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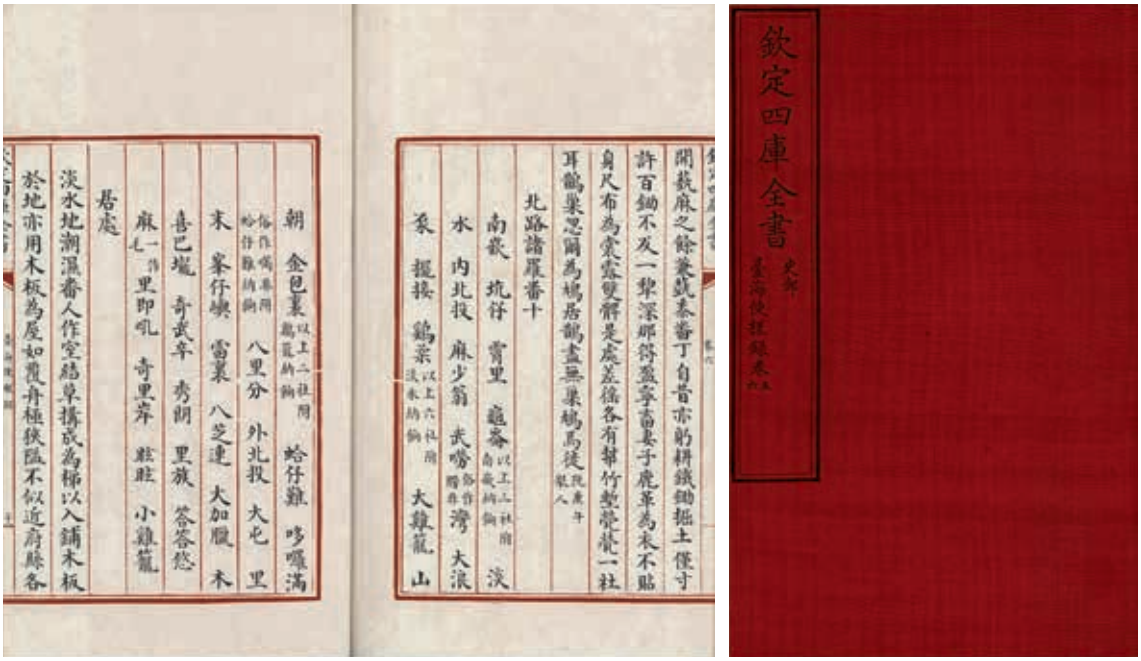

圖11　清　黃叔璥　《臺海使槎錄》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2841

圖12　清　乾隆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冊　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999
乾隆年間鳳山縣境內的土牛紅線標示與隘寮

圖13　清　乾隆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冊　建設淡水廳望樓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997
乾隆年間淡水廳境內的土牛藍線標示

因此原本只是身分的區別，卻又與文化表現比附、關聯了起來，爲族群創作出了一些基礎。更甚的是，二十世紀前夕，日本學者伊能嘉矩（1867-1925）以人類學的概念詞彙「族」，將「熟番」比附爲「平埔族」，於是原來只是身分（政治）分類的「生、熟」，就更走向了族群的分類。因此，清帝國已經逐漸遠去的二十世紀初年以後，原本應該將失去其特殊身分的「熟番」，就在伊能嘉矩藉著新論述（人類學話語）「族群化」，成爲「平埔族」了。（圖 14）

有關逆寫活動

關於逆寫與共筆的計畫，在國內博物館界是相當罕見的，院長希冀這個活動帶來何種影響與迴響？

其實所有的歷史研究，都在做某種程度的史料逆讀和逆寫，否則研究就會成爲只是在收集史料、彙編史料、當史料的傳聲筒而已。我們不是常說要「穿透紙背」地閱讀嗎！既然這些檔案對於原住民族來說，是從「他者」出發所寫成的，那麼就應該有從原住民族的主體視角加以逆寫、翻轉閱讀的必要。何況，帝國政府（皇帝）、當時的官員．文人（具有書寫能力的士大夫），是帶著各自的意識形態、目的、甚至想像來寫下這些文字的。（圖 15）

「逆寫」這樣的詞，特別受到後殖民主義的歡迎。因爲它積極反省殖民主義，並強烈企圖翻轉帝國．殖民主義與被殖民者的主客體位置。這也不是很新奇的觀點，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任何文本都存在著或隱、或顯的意識形態運作與權力關係，我們閱讀時必須看穿各種意識形態與權力在其中的作用。將近十年前，我就發現我們高中生的『公民與道德』教科書中已經介紹法國學者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了。顯然，我們的新一代已經多少有一些知識準備了。

圖14　伊能嘉矩　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8%83%BD%E5%98%89%E7%9F%A9（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2年5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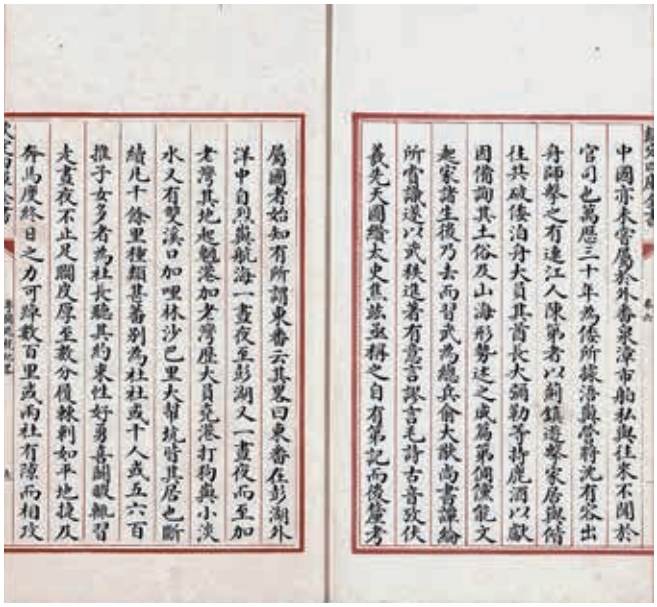

圖15　清　杜臻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0159

圖1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2018年舉辦的「南方共筆：輩出承啓的臺南風土描繪」之展覽專刊　取自https://reurl.cc/n1N1e8

國內的博物館，或許還少直接採用逆寫（其實，它應該多少會表現在展覽當中），但已經有博物館採取「共筆」了。據我所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就曾經推出「共筆」的展覽。（圖 16）共筆，其實就是讓更多的人一起來參與、完成展覽。這裡的更多人，可以是專家，也可以是觀眾；參與、完成展覽，可以在事前的展覽規劃階段，加入意見，也可能在觀展過程，持續添入新的詮釋，甚至形成對話。

逆寫夥伴計畫邀請了兩個學術單位（清大臺文所、政大民族所）與國立臺灣文學館，這樣的組合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

目前國內比較熟悉「逆寫」的是文學研究者，所以這次邀請了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該所的劉柳書琴教授，本身是文學研究者，也從事文學創作，又具有原住民身分，因此是個很適當的人選。國立臺灣文學館，一直很關心原住民文學，與原住民文學家有長期的合作關係，由他們來組成一個逆寫組合，可以說順理成章。至於政大民族所，則是專門以族群問題爲研究對象的學術單位，更是不能沒有他們的參與。

未來會和其他館舍與學術機構聯合舉辦大型原住民展覽嗎？

故宮的臺灣原住民族相關收藏，主要是檔案文獻，很難做引人興趣的展覽。但是如果其他博物館以多維的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作展覽，故宮則可以適當地利用本院藏有的檔案文獻來做配合。

註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網址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
2. 現改稱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3. 楊慶平，〈清末臺灣的「開山撫番」戰爭（1885-189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論文，1995）。
4.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箚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 卷 2 期（1989.6），頁 95-98；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箚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39 卷 4 期（1989.9），頁 73-82；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 期（1991.6），頁 46-50。
5. 林欣宜，〈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周玉翎，〈臺灣南端尾閭恆春的族群與歷史（1867-1904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0）；王慧芬，〈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0）。